



THE STATE OF THE UNION

2016年欧盟状况：欧洲和世界舞台的女性
欧洲大学研究院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罗斯·卢比奥·马琳(Ruth Rubio Marín)教授之主题演讲
2016年5月6日，佛罗伦萨旧宫(Palazzo Vecchio, Florence)

(简体中文译本¹)

I. 简介

亲爱的来宾、同事、尊敬的官员和朋友们，在场或不在场的伟大母亲们，以及承担起母亲工作的父亲们，还有今早坐在我孩子西蒙和卢卡斯身边的我的母亲，我深感荣幸在此，在这座由曾经满座均为男性的佛罗伦萨共和国议会使用的大厅里，谈谈当今欧洲及世界女性状况。

女士们、先生们，欧洲自60多年前，欧盟作为涉足人类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组织成立以来，便一直在挣扎，如今已陷入更深层次的斗争之中。欧洲正经历着一场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有着十分严重的社会影响。欧洲遭遇的不仅是持续增多的恐怖主义，还有兴起的民粹主义，排外民族主义，信仰不同信条的原教旨主义。希腊退欧的风险还没有完全退去，英国退欧的消息一直若隐若现，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近，这都反映了人们对欧洲一体化的幻灭。成千上万的难民溺死在海里，而更多的、超过百万的难民们

¹ 此简体中文译本源自一篇欧洲大学研究院的欧盟状况演讲辞，演讲于二零一六年五月六日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旧宫发表。此译本由 (按姓氏笔划顺序) 瑞嫻女士(Ms MA Ruiyuan, Ada)、刘曼女士 (Ms LIU Man, Anna)、莫望先生 (Mr MOK Mong Chan, Lewis)，以及黄衍达先生(Mr WONG Hin Tat, Henry) 在Professor Sandra MARCO COLINO指导下共同完成。

有关引文及参考文献目，请参照Professor Ruth Rubio Marín的“Women in Europe and in the World: The State of the Union 2016”，14 I.CON (2016) 的英文原稿。

敲着我们的门，乞求得到具人道和尊严的回应，而我们事实上都知道，那是他们应得的。我们深知其理，因为当我们的祖先面对被迫害的恐惧，战争和其他对生命的威胁时，也曾敲着同一扇门；或许因为在不久前，对于许多人来说，我们自己也是加害者。有些人可能自问：此种情形下，一个讨论女性问题的学术会议到底有什么用呢？

现在，我有一个问题：何时才是讨论女性问题的适当时机呢？如果我们回顾大约一个世纪前的历史，那时欧洲各国上演着女性投票权的斗争；许多例子展示着女性斗争如何被劝阻，为了人们期望她们所具有的大度和自我牺牲，以造就所谓“更重要”或“紧急”的、以自由和平等为名的理由：社会阶级斗争，民族主义运动，保家卫国，或是对抗旧政体中教会和君主势力的斗争。但是今天，我们必须承认，在追求平等和自由时，让女性参与欧洲的“民主建构”也是当务之急。而在以前，这一点恰恰是被社会否认的。所以，今天我必须声明，在这个关键时期，欧洲对于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承诺已危如累卵，其对女性问题的回应也是决定其成败的关键因素。

但是你可能会问自己，既然当今女性已拥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和自由，既然今天我们的司法系统已抹去父权制的痕迹，删除那些使女性成为弱势群体及含有歧视和偏见的条例，那欧洲当前面临的女性问题究竟是什么？然而不幸的事实是，尽管拥有了与男性相等的法律地位，占欧洲超过半数人口的女性依然是受压迫的群体。这种现象如何理解呢？哲学家Iris Young生前曾在她的著作中解释道，一切阻碍人类成为完整的人的行为，例如是受到非人化的对待，还是在思想或身体上被剥夺了行使完整人权的机会，都算是受到了压迫。请记住，压迫不只在心怀恶意的暴君底下发生。在一个看似充满善意的自由社会也会限制某个群体的一系列活动及其自由，而这种限制靠的不仅是明文规定，还有不容置疑的规范，习惯和标志。根据Young的说法，压迫有五种形式：暴力、剥削、边缘化、无力感和文化帝国主义。

女士们，先生们，或许有些矛盾，但我们还是应该恭喜自己。因为我们终于有证据证实，在日常生活中，欧洲的女性或多或少面临着以上五种形式的压迫。这些数据由近年严谨缜密的研究所得，包括欧盟基本人权机构(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于2014年进行的首个对女性遭受暴力的普查、一份针对来自28个欧盟成员国的42,000名女性的采访报告。此外，我们还有同年由欧洲委员会发布的关于男女平等的研究报告，以及欧洲性别平等机构(European Institute for Gender Equality)提供的性别平等指数报告。这两份报告缜密的衡量了欧盟的性别平等，并且通过追踪欧盟政策框架下各领域（包括工作、收入、知识、时间、权力、健康、暴力和交叉领域的不平等）的男女差距，对比了从2005年到2012年性别平等问题的变化。

根据以上数据，现在我来解释当今欧洲女性仍受压迫的原因和形式，并且设想未来可能出现的局面。此外，我将探讨未来对欧洲自我理解——即作为一个宣扬民主和平等的地缘政治空间——的影响。而本人认为，她宣扬的价值正正是欧盟的存在意义。

首先，我们先来说说数据带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如何看待女性受到压迫的五个形式？

II. 压迫女性的形式

暴力

首先，也是最为严重的是暴力。

近来，很多公众注意力都聚焦于移民女性，西方正关注着东方化的“另一类女人”，包括在性剥削中受害的妇女和生殖器被切割的女孩。但是，来自保护基本人权机构（FRA）的报告讨论的对象不是她们，正是我们欧洲女性。在今天的欧盟，我们了解到的是三分之一的女性从15岁起至少遭受过一次肉体或性暴力，受害者总数达到59,400,000人；15岁以下的女性受害率与此相当。我们了解到，二十分之一的女性，约900万人，从15岁起至少被强奸一次，这给幸存者留下很多心理阴影，如恐惧、愤怒、羞耻、不安、甚至丧失自信。我们了解到，在欧洲，有45%到55%的女性遭受过性骚扰；18%的女性遭受过某种形式的跟踪(stalking)，其中在年轻人中的一种新趋势是网络跟踪(cyberstalking)。而我怀疑这些数据尚未包括各种会给脆弱的女性，包括移民的女性，难民和寻求庇护的女性，根据定义，往往生活在社会和法律秩序边缘的不同能力(differently abled)女性，带来截然不同影响的暴力形式。

女士们，先生们，最让人痛心的是，事实上，五分之一的女性受到的肉体或性虐待来自前任或现任伴侣。与此同时，非常、非常可怕的，是只有14%的女性向警方报告了由她们亲密伴侣的引致的最严重暴力事件。

女士们，先生们，无论你们如何描述欧洲女性现在的情况，对于我来说，无论在家中，学校，社区还是工作单位，欧洲的数百万女性同胞都生活在恐惧和压迫之下。

剥削和边缘化

剥削和边缘化分别是压迫的第二和第三种形式。

目前，欧洲工作的女性比例仍为63.5%。即使在同一个岗位，拥有同样的学历，男人每挣一欧元，女人只能挣84分。普遍来说，几乎每个员工的收入都是不透明的，这使得男女收入差异问题(gender pay gap)一直持续至今。更令人担心的是，男女退休金的差异约为38%，约三分之一的女性甚至没有退休金，这使高龄妇女和单身妈妈陷入了最大的贫困和被排斥的危机之中。

职业隔离将女性集中在低收入行业。从事兼职工作的就业女性比男性多出四倍，且多包括在无报酬的家务劳动和带薪工作。整体而言，达37%收入的差异是基于较少的钟点收入、较少时间做有偿工作，和高薪工作的低代表性。然而，现实中经济资源上的性别差异十分巨大，可惜我们缺乏基于性别的其他金融资产（例如债券或房地产）的数据。

同时，女士们、先生们，男性工作者每周仅花九小时于无偿照料工作以及家务上，相比之下，女性每周26小时的时间几乎是男性的三倍。同时，女士们、先生们，众多移民女性成为低收入的黑户(off the book)保姆、管家或老人的护工。这容许高收入的女性增加其市场工作的时间而毋须公共补贴。这种以市场为基础提供照料服务的解决方案，於短期内可能具有成本效益，但长远而言缺乏可持续性。输出移民的低收入国家没有任何能力从中获得收入来照料和教育自己的国民，只能依靠(往往是暂时的)自愿汇款和日渐耗尽本身的社会资源。

这正好是Young所谓的剥削，即用人民劳动力创造利润却不提供合理补偿；也正如她定义的边缘化：贬低一群人的社会地位或将其驱逐至社会边缘，正如欧洲及其他地方的伟大的母亲们(Eccellentissime madri)的处境如出一辙。

无力感

无力感是压迫的第四种形式。

在成员国中，尽管几乎代表雇佣劳动力的一半，大型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女性占比仍不足四分之一。截至2014年11月，平均而论，他们仅占当选的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的28%。

虽然欧盟机构已取得一些进展，但我们离平等还有差距。目前欧洲议会的女性成员处于历史高位的37%，但仍低于平等线13个百分点。新欧洲委员会包含19名男性和仅仅9名女性；欧洲法院女性法官仅占21%；欧洲中央银行理事会仅两名女性，相比之下男性22名。

毋庸置疑，低收入或移民女性能打破职场中隐形障碍，进入男性主导的权力、权威和决策领域的人数，只有少数。

文化帝国主义

最后，文化帝国主义。

性别不公的根源在于男性中心主义，政治理论家Nancy Fraser将它定义为一种制度化的文化价值体系——珍视男子气概而贬低女性气质。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体系不仅明确地写在各种法律和政府政策中，也出现在流行文化、言辞的选择和日常的交往当中，甚至出现在市场中。难道女性的工作(除了报偿最少以外)只是恰好，一如所料的，是与维护关系、关怀和付出相关，而且非常劳动密集且难以提高生产效率的工作？事实上，女士们先生们，关怀性工作对于维系这个市场经济的社会至关重要，但伟大的母亲们(Eccellentissime madri)的社会价值没有被充分地承认。生产和生育性质的工作之间有着长久以来的高下之分；而且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祖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认识到的那样，社会收益与个人回报之间完全没有联系。社会规范，而不是清楚的边际生产率的概念，在决定工资。来想一下Perrons和Plomien提供的例子：一间倒闭的英国银行的前任高管被留任做重组事宜的顾问，他的月工资竟是一位有二十年经验的育儿员年工资的3.5倍。

但是，男性中心主义不是欧洲的女性遭受的唯一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异性正常论和宗教性以及道德性的帝国主义也在影响欧洲女性的生活：这在希望完整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期待的女同性恋者，寻求性和生育自主权的吉普赛女性，希望得到法律认可的跨性别者，或者希望能在大学戴头巾的伊斯兰女性身上可见一斑。

III. 未来的选项：欧洲的关键时刻

那么，欧洲已经为此做出了怎样的努力，欧盟又正在做些什么？欧洲，女士们先生们，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让我来解释以下为什么：

自从成立以来，欧盟一直致力于推动经济增长和加强社会凝聚力。从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开始，到里斯本政策(Lisbon Strategy)阐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支柱，欧盟对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关注乃至提升人们生活的终极目标贯彻始终。现在，它发展成为欧洲2020规划(Europe 2020 agenda)所述的智能的、可持续的、包容的增长。

从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中公平报酬政策开始，已有很多指令(directives)和政策革新在推行性别平等。最新的规划中，性别平等仍是重点，而且被视为成功实施经济规划、实现增长的关键。性别平等一直以来的目标都是在就业和社会服务领域为女性提供公平的机会，避免她们因为做母亲而受到歧视；这就包括欧洲一直致力于达成的，自福利国家主义出现起(since the incep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对于家庭和母亲的保护。

尤其是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在就业机会没有上限的假设下，欧盟的欧洲就业策略(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让推动女性就业和性别平等有了新的立法依据；该策略推动所有的欧盟成员国改进他们的亲子家庭结构，增加看护儿童的社会服务，来提升母亲们的就业率。另外，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欧盟和欧洲委员会同时将为女性赋权这更有雄心的目标设立为评价民主的基本标准，在全球层面上呼应了北京会议及行动纲领(Beijing's Conference and Platform for Action)表达的同样的关切。发源于欧洲的均等民主已成为不少国家的目标。

但可悲的是，对近期欧盟政策性文件的目标、手段和政策环境的分析得出，它们对性别问题的关注远不如过去几十年里那样充分。欧洲政策在性别问题上的紧迫感正在减弱，这和金融与经济危机的爆发和随之而来的紧缩性政策密切相关。不幸地，将经济危机视作男性为主的观感，导致应对危机的政策制订忽略了性别平等的考量。在许多国家，对性别平等的投入被削减，性别平等政策被停止或者大幅减少。这似乎在暗示，这些政策最多只会在当下的危机中分散焦点。但是，最近几年里并不是毫无起色。尤其在停止暴力方面有了里程碑式的进展，例如在2011年通过的的伊斯坦布尔公约(Istanbul Convention)以防止和打击针对妇女的暴力和家庭暴力。我们也应该祝贺在欧盟层面通过的2011年防止及打击贩运人口指令(Directive on Preventing and Combating trafficking in human beings)和2012年受害者指令(Victims Directive)。但

是除了将父母双方假期从三个月延长至四个月的框架性协议，其他致力于为女性赋权和消除性别角色差异的法案都没有通过，包括对产假及工时指令 (Maternity Leave and Working Time Directive) 以及公司董事会性别平等指令 (Gender Balance on Corporate Board Directive) 的改革提议。

所以，危机、危机，紧缩，然后是更多的危机！但是女性和性别差距在危机和紧缩性政策下得到了怎样的对待呢？这些事实又为我们预测了欧洲女性怎样的未来呢？从Karamessini和Rubery的研究中，我们大致学到了三点。

首先，尽管危机爆发以来男性与女性的就业率都大幅降低，由于所谓的附加工作者效果 (added worker effect)，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度反而在近几年升高了。失业的女性更加不会退出劳动力市场，而是继续寻找工作。当中不乏首次加入劳动市场或担当唯一经济支柱的女性。在更先进的经济体中，回归以男性养家为主的模式似乎更加不可能了。这种模式需要重建传统的具有强烈纽带的家庭关系，保持男性的就业率和足够养家的工资，这几项现在一样也没有。实际上，在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下，同时延长男性和女性的就业时间是大势所趋。

第二，就业上的性别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被消减了。但是这主要是因为男性失业率上升以及更多兼职工作的选择，还有影响所有人的减薪和工作环境恶化。所以，换句话说，由男性地位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性别差距。

最后，在紧缩和整合性的财政政策下，公共部门的规模被缩减，而公共部门又是女性重要的雇主——一部分是因为他们能照顾到女性做母亲时的需要。同时，国家也不再提倡社会再制 (social reproduction)；主要表现为减少为工作的父母提供的援助，以及减少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的长期照顾。就像女性主义经济学家 Nancy Folbre 指出的那样，这样的变化意味着性别不平等本身已经不如被称为“母亲贫穷化” (pauperization of motherhood) 和“贫穷母亲化” (motherization of poverty) 的趋势来的要紧。不必说，这趋势对于女性有着迥然不同的影响。

继续发展下去，这些趋势看上去指向两种可能的场景。我必须声明，其中只有一种场景符合欧洲最初对于追求性别平等、民主和社会公义的自我理

解。

在第一种场景中，新自由主义倾向愈演愈烈，认为经济和经济政策是创造财富且有效率的，而社会政策作为成本是效率低下且阻碍发展的假设，将会持续。很多人认为在这种情形下，社会将在阶层与种族方面更加两极分化。这即是说，在受教育程度或技能水平更低的移民群体之中，不同性别间的财政与就业情况会趋于平等；但是在受教育程度较高或具有高技能的人群中，性别差距会变大。这已经是美国社会的现实了。这就会导致两个群体间的不平等扩大，和男女就业情况整体性下行。与此同时，如果国家没有发展出社会护理支持系统或者削减已有的供应，不同基层和性别的人会有不同的应对。受教育程度更低的女性会做更多无报酬的工作或者做更多兼职工作；而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女性则会更加依赖付薪的家庭帮工或者需要伴侣更平均地负担无酬的家务。在这种情形下，最需要帮助的群体——来自更低社会阶层的女性、移民女性、年轻女性和单亲母亲或父亲——将最有可能成为被牺牲者。生育率会维持在低水平，家庭和性别的保守意识形态会因此更具有影响力，尤其是但不仅限于一些比较新的欧盟成员国。这可能会在欧盟内部产生更多的裂痕。

在另一个场景中，正如一些人所提倡的那样，当今全球的经济危机应该为视为一个从盛行的新自由资本主义中转变的机会。大家应该考虑号召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模式。不同于传统的左翼立场，这种模式有了性别的视角，它也对市场外的行为——包括关怀——进行考虑。这个新的具有革命性的框架需要继续挑战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角色成见，也需要综合经济、环境和社会再制(social reproduction)方面的考虑。令女性在每项决策中拥有平等代表权(即均等民主)，将会是规划的一部分。但是仅仅是各性别代表人数的平等是不够的，这个计划需要实行创新的性别平等政策，比如宏观经济政策上的性别导向和性别平等预算。工作生活平衡的政策应该被视为从根本上利于所有人的，而不只是利于女性的。这就需要社会提供可负担高质量的儿童照看服务、放学照看服务以及为其他不能独立生活的人提供的服务(包括年长者和不同能力的人)。这就需要男女平等的不可转让的有薪假期，更加灵活的工作安排，例如工作共享、在家办公、灵活办公时间和鼓励平等分担工作和照看的创新政策(包括通过税收政策鼓励)。

最后，只有在第二种形式中我们才有希望消除当今仍然通过欧洲女性所受压制的五个形式展现出的性别差距，才能克服长久以来通过各种形式伤害了众多女性和男性的性别意识形态的顽固性。只有在第二种情形中，我们可以防止中产和低下阶层状况的恶化，才可以阻止由此而来的恐惧、不安全

感和被剥夺感，年轻一代人——女士们先生们，这是失落的整整一代人——受此影响太大了。因为这种恐惧、不安全感 and 被剥夺感只会引发尤其是以控制女性的身体和性行为为主的原教旨主义。这只会引起种族主义、排外心理，和民粹主义。这样对参与维持养老金制度，保持人口增长，照顾我们的小孩和老人的移民，以及寻求庇护的人来讲，都是地狱。恐惧、不安全感 and 被剥夺感，这其中任何一种都不会鼓励欧洲的男性，包括年轻的男性，丢弃一种卢梭(Rousseau)会称之为“主人对奴隶的幻觉”(illusion of the master over the slave)，亦即男性主导的思想，因为男性可能将基于性别的阶级观念当做他们最后的堡垒，以及在有如被阉割后的背景下的自我认知。这意味着在自己的家中被胁迫的女性的苦难将持续下去。如果这些势力成为主导，女士们先生们，伟大的母亲们(Eccellentissime madri)，欧洲不仅会失去它对平等和公正的承诺，亦会一并失去自己民主的信誉。

所以比起从前的任何时候，现在正是提出妇女问题以及其他密切相关议题的最佳时机。这个五百人大厅，正是采取行动的合适地点，因为这大厅在1494年，正正在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遭到的一次驱逐之后建成。而佛罗伦萨，正是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这打破了各种形式的中世纪教条主义运动的摇篮。就像在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要面对和考虑女性问题，就需要打破缺乏监管的全球金融市场、紧缩财政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和人类自主的教条，。就像文艺复兴时那样，每一名男、女性，都需要从各种形式的暴政和他们的现代形式中，被拯救出来。

谢谢！